

世界文學史

史學文界世



著編陶慕余

海上
樂華圖書公司出版

1932

“上 冊”

1932, 9, 20. 付排

1932, 11, 20. 出版

1—1500册

每册實價大洋六角

上海樂華圖書公司發行

四馬路太和坊內

敘 言

『我們祇知道一種科學，一種歷史科學。』

這是一句『偉人』的說話，這句話指示出我們應特別注意歷史。是的，歷史是應該特別注意，因為不懂得歷史，便什麼學問都無從下手。說這句話的『偉人』，他在學問上之所以能收得到空前的奇蹟，自不能不歸結到他對歷史的理解與熟習！

中國的新時代正是這樣一幕幕地展開着，一般智識的勞動者因為受了這新時代的啓示，都很努力來做這門歷史的工作。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讀書雜誌的中國社會史論戰，不怕都有錯誤，甚至還沒有得到中國社會史的具體結論，但不能不算是一種極有意義與價值的事體。

我們對於這門工作，祇有希望或從旁來促成牠能達到應當達到的階段！

在新時代面前的中國出版界，我們認為有很不滿意的，便是作者與讀者之間，彷彿是同樣地忽略了文學理論，特別是文學史一類的東西。雖然，關於文學理論的著譯，年來還有某某人的文藝論集，及一些俄國的浦列漢諾夫、盧那卡爾斯基等的介紹；但關於文學史的著譯，除有過一本弗理契的歐洲文學發達史的移譯作，比較像樣的著作可說是簡直沒有。

我所整理的這本世界文學史便應這個原因出現着。

本書是依着這兩句名言：『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影，』及『有了十月革命才有俄國現代文學』寫成功的。這可以說是脫掉了中國這一類著書的無意義的因襲。最主要我是在本書裏提出了推動文學向各方面發達的歷史的物質的源泉。

現在來先說西歐文學罷：

我們研究西歐的希臘文學所首先感覺的困難，便是荷馬是否存在過。關於這個問題的解釋，有許多學者都集中在他的史詩方面。這當然是得不到結論的，因為在一樣的圈子裏兜來兜去，還是在一樣的圈子裏。對於這個問題，我在本書是提出了當時的希臘社會的情形，而斷定荷

馬是有的，接着，我便根據了希臘社會的進展，又來說明了荷馬以後的希西阿，莎孚，及希臘的悲劇作家。

其次便是基督教文學。羅馬在二三世紀時，把基督教徒逼害得無可形容，這因為基督教是代表商業資本的，而羅馬在這時恰恰由商業資本退步為復古的自然的封建經濟。羅馬帝國本來是靠着商人與封建地主撐扶着。在商人與地主的經濟欲望之下，帝國才不斷地向歐亞非三洲遠征，遠征的結果，便把所俘虜的土著都當作帝國的商人與地主的奴隸，有了這批奴隸，帝國才一天一天更繁榮起來。但後來，帝國的武力竟為當時的地域所限，即是牠把所曉得的地方都征服了，再沒有用兵的地方了，帝國的商人與地主所需要的奴隸便無從所出了，因之，牠的生產便低落起來。這時，過剩的軍隊皆因停止征伐，一變而為城市的流民無產階級，他們隨處都向城市的官長要飯吃與要衣穿，這已經有了擾亂社會的趨勢了，何況被征服了的土著民族又常因抗租抗稅而不斷地向帝國暴動！帝國對第一個問題的處置，便把大地主的土地劃分為幾個小地主的土地，讓這些在城市騷亂的失業士兵轉化為農奴，自由耕耘；對於第二個問題，便容許其

他民族同化。小地主常因這些外來民族——特別是法蘭克族，保護得力，慢慢擁護外來民族而致形成一種小國行政，這樣，中央集權的帝國政府便就成爲贅疣了。這便是帝國復古的原因，同時也是所以殺害基督教徒的原因。

基督教徒在這樣一個環境中，已不能進，自然祇好退，他們也逐漸腐化到與外來的民族相勾結，例如他們會幫助法蘭克王征服野蠻民族，及清理湖沼山林與教育人民栽種百物等等，都滿能得到這些上層者的歡心。這些上層者爲了報酬基督教徒的善意，不惜賜予廣大的土地與基督教會，從此，牠就發展成爲一個封主與諸侯一般；基督教再從此就擴展到獲得政權，而爲行政元首的法皇，接着，基督教文學也就產生出來了。

再其次便是文藝復興。誰都曉得文藝復興是有兩種任務：一是學藝復古，二是追求新生。第一個任務之所以發生，是由於爆發文藝復興的佛羅蘭斯的經濟組織，剛剛發展到和當日的希臘經濟組織相吻合了，故此，這般運動的學者，都莫不從事發掘希臘，仿效希臘。所謂追求新生便是西蒙治(John Addington Symonds)的『世界發現』，因爲世界的發現，即是海外交通的擴

大，新大陸之發現，使得人生又來了一種新的世界觀。文藝復興期的海外交通雖然是擴大了，新大陸雖然是被發現了，終因爲資本主義的交通手段還沒有創造成功，世界經濟仍徘徊在商業資本的範圍，故各國的政治都發生絕對的君主專制，文學上的古典主義也因之而穿了黃袍現在人間。

浪漫主義文學是跟着產業革命(1730)後的資本主義社會來的，自然寫實主義文學是跟着資本主義社會的悲慘生活來的。資本主義并不是永遠的社會形態，牠發展到了不能再發展時，祇好停滯着，因而產生出贊武主義的崇尚戰爭，所以，文學上又有所謂象徵主義，未來主義：自從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以後，人類就分成了兩個對壘；一個是面團團地盡性擰取，一個是血淋淋地拚命反抗。前者是以帝國主義爲指揮，後者是以蘇俄做統領，鬪爭是日益白熱起來。

本書對於革命作家如高爾基，辛克萊，巴比塞等等的作品都有詳細的介紹，讀者自然會明白。

現在掉回來說說中國文學罷：

我說中國的封建社會從周室東遷以後便開始崩毀，崩毀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交換經濟佔據了城市，破壞了鄉村的自然經濟。我的證據是：『弦高犒師，陽翟商人呂不韋用計相秦晉之絳商通於諸侯，陶朱公運動楚國大赦……』秦是中國商業資本的集權國家。牠的焚書與坑儒都祇限於與當時的商業資本統治有抵觸的什麼腐儒的言論，及腐儒的行動等等；牠的『沒收天下兵器，鑄爲金人十二，藏之咸陽』亦祇限於企圖死灰復燃的已失勢的封建諸侯。然而秦却沒把牠當時的社會矛盾——土地集中與農民破產，解決下來，因之，牠又在這種矛盾中崩毀了。

中國的社會，乾脆說來，便是循環着在封建經濟與商業經濟之間。秦之統一戰國是商業資本的力量，但秦之滅亡亦因商業資本的力量。從漢至帝國主義的鴉片戰爭時止，每一個朝代的產生都莫不起因於前朝的破產的農民暴動來的。農民之所以破產不消說是商業資本發達的結果。這樣，我們可以說中國每一個朝代的開始是比較復古的且比較與農民利益相適應的，後

此則慢慢前進起來，且慢慢離開了農民的利益。

何以中國社會竟會走上這循環着的圈子？

這便是由於中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由於中國的河流和豐饒的自然財產來的。中國因受制於由西向東流的河流，所以中國歷代文物便很難走到和海洋接觸的南方；中國因受制於地大物博的自然財產，所以中國便很難持續其對外的長期貿易。這樣，中國自然不會產生什麼資本主義式的交通手段如蒸汽機，火車……中國愈沒有這樣的交通手段，牠便祇好愈來在牠的舊的道程上面徘徊着。

那末，中國的文學呢？

中國的文學也一樣是循環着在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等等的局面裏。我們曉得春秋時代已經有了《詩經》和《楚辭》；兩漢時代有辭賦，歷史及五言詩；六朝又是詩和賦；唐朝除詩是特別發展外，亦有散文，傳奇，或雜劇；到了宋時則有詞，詞是中國文學的特殊形式（外國沒有這個東西）。

這是由於中國商業資本始終超越不過牠的命運，而配合了當時的兵連禍結的不安全的社會生活產生的。宋除詞以外，亦有詩和散文和雜劇和傳奇；元朝却比較單純地發展着戲劇，這因為元朝的商業資本勢力是特別大的原故。然而元朝亦有傳奇、散文、詩等等，明也是一樣。

像這樣交錯地發展——不過，在本書的正文，我却敍寫每一個朝代的文學特點——着的文學路線，因外國的階段森嚴而不容混亂的文學趨勢，却完全是兩樣。元的戲劇依理是可以馬上超越那種傳奇，或章回式的小說，一直走上到目前的資本主義式的小說階段的，無如元的商業資本的統治不久便葬送在牠的北方軍事部落的壓迫漢人的鐵腕下面。元朝統一中國不久便因中國商人的民族意識與破產農民的不斷的聯合騷擾，使得牠很容易就喪失了對外的種種交通。元的戲劇因此又不能不多走一條岔路，變為明代的章回小說。

不過，唐的李白和宋的蘇軾，在這兒，我們却不能不另外說一說。他們兩人實在太偉大了。

當開元天寶時代，所有詩人都莫不兢兢於沈宋所開下來的詩格，獨有李白能反此。他的詩向不受格式所限，他想寫什麼，便寫什麼。例如：『兩人對酌山花開，一杯一杯復一杯；我醉欲眠卿

且去，明朝有意抱琴來。」他也常寫長詩，但他的長詩也處處表現着文學的商業都市的風格：如蜀道難，遠別離……忽而七言古詩，忽而五言調子，忽而又散文。他祇在追求曲酒和好月，他祇在否認現實，他這些生活精神都與當時的多數人不同的。我們說他簡直是當時比較前進的商人階級，快要因各地的封建諸侯，特別是安祿山的作亂，而受到種種痛苦，才無意於現實的利祿地位，且祇在幻想現實以外的天地。他臨死時的撈月的錯覺舉動，便是他的必然的結果。

宋的蘇軾也是一樣。他是宋時的前驅，他用粗豪的文句來寫他的詞，他終能突破當時氣息沈靡的文學界。不消說，他是一位大天才，因為他是大天才，所以他也能忍受時人所忍受不起的種種失意苦況。這便是他預先覺到宋不能解決牠與遼金的對立關係，終會使宋消滅在這種矛盾中間。這樣便產生出了他的極端濃厚的民族意識的懷古情調。這種情調的表現必然是慷慨激昂的粗豪的詞句。他這種前衛般的意識與表現的手段到了南宋時便發生極大的影響，幾乎所有南宋的文人學士盡走上了同他一樣的內容與形式，例如辛幼安，陸放翁……同時，他的赤

贊懷古在南宋也變成爲詞的正宗。這自然不是偶然的。我們曉得商業資本愈發達，民族意識便愈見濃厚，這因爲商人階級要求着一種強有力的國家組織，好來保護他們的利益。像南宋時所受到金人的騷擾：皇帝被擄，首都被遷等等，無疑地會激發出文學上的民族英雄。蘇軾可算是這些文學上的民族英雄的前驅！

中國文學到了清初還是走着明的章回小說的路線。並且清的章回小說也來得特別發達。比方《聊齋誌異》、《子不語》……之寫神怪妖仙的事體，都與明時的反元的民族意識有關係。因爲清的文字獄太利害，犯者常被誅連九族，所以當時的小說作家便祇好採取狐仙妖怪來比擬清的統治者。這樣的民族意識到了七俠五義、《鏡花緣》等，更畢露無遺。七俠五義描寫宋包拯得有三俠（展昭、歐陽春及丁兆蕙）及五鼠（盧方、韓彰、徐慶、蔣平和白玉堂）之幫助，到處破大案，平惡盜并定襄陽王之亂。這分明是否定當時的現實社會而理想另外一種以漢人爲中心且得賢臣左右而使百姓能得平安樂利的社會。《鏡花緣》這部小說的背景是唐武則天的亂事。牠會寫及

徐敬業討武氏的失敗，及失敗後，忠臣弟子則四散避難於他方；此時有名唐敖的人亦因失敗而依其內弟林之洋商舶至海外遨遊。他在途中經歷了許多怪事，且遇見了許多怪人，最顯著的莫如他遊歷女兒國爲該國的女兒壓迫裹足，當作她們的玩品；他後來到了一仙山，食仙草變仙去了。他的女兒閨臣因失父便遊龍返唐，適唐武氏開科試才女，諸才女均聚會首都，大事宴遊，不久勤王兵起，諸才女又參加戎役，努力討武氏的事業。這裏面的武氏自然是清；這裏面的女兒國的女兒壓迫男人自然是代表女子反抗清對女子的玩弄；這裏面的勤王自然是反清復明，這裏面的主角自然是反清的女鬪士。

不過，清却產生了不少描寫破落戶的貴族子弟的處境，及破落戶式的士大夫的試場與官場的黑暗。這到是明的章回小說所沒有的。這種小說，我們可把紅樓夢、儒林外史……當代表。

清自一八四二年受到了鴉片戰爭以後，接連就有太平的農民暴動，義和團暴動，中法之戰，八國聯軍入京，甲午中東戰爭……這使得清室益加衰微，終至崩毀。我們歸根究底來說，清自帝

國主義侵入以後，牠的炫燿的物質商品却把當時的大地主和大商人都刺激起來了。這已經刺激起來了的大地主和大商人盡都變賣其鄉村裏的土地，通集中到城市方面來開工廠，希望走上洋商人的道路。清的社會經濟已有了這樣的新轉變，政治上自然要跟之而轉變，這便是康有爲所領導的『戊戌政變』所以產生的原因。但是正因為『戊戌政變』的失敗，這新興的民族商人階級便處處認明清的政治形態已成爲牠的桎梏，非先打倒這一桎梏，不足以謀中國的富強，何況當時外來的帝國主義勢力又依了與清所締結的不平等條約是那樣一天一天膨脹！這兩種勢力終匯合起來爆發了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雖把桎梏新興勢力的清廷打倒了，但是帝國主義的力量依然存在着。帝國主義在中國，一方面刺激了新興勢力且相當地幫助了新興勢力打倒了舊的政治形態（不消說這舊的政治形態亦障礙了帝國主義的經濟侵掠），另一方面則在靠着在華所有的政治的優勢扶植起新的政治人物以作牠的工具，及利用其價廉物美的商品壓迫着中國的幼稚的民族資產階級。

辛亥革命始終是失敗了。在政治方面，牠雖推倒了一個『寧贈外人，毋給家奴』的滿清，但接着却產生出了無數和滿清一樣的新政府如袁世凱，黎元洪，馮國璋，徐世昌……在經濟方面，牠不特沒有把新興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勢力發展出來，反而從封建的統一的滿清政府弄成爲割劇式的軍閥政府，這使得新興階級更受着種種不統一的障礙而不能發展其經濟，同時，帝國主義却利用了這一個不統一的局面遂行了其經濟的侵掠。在思想方面，牠更沒有把封建式的愚忠愚孝和不值錢的綱常道德打破，這點自然是必有的結果，這因爲辛亥革命的政治和經濟兩方面都受到了失敗的打擊。

一九一四年世界大戰爆發出來了，帝國主義因忙於西歐的戰爭，遂把東方的壓迫稍爲放鬆了，這千載一時的機會却使得幼稚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相當地發展了一下。因此，在『戊戌政變』時及在辛亥革命時所沒有完成的思想革命和政治革命，到了這時都一齊迸發出來了。這便是五四運動。五四運動的確是中國命運的新轉機。我們看當時北京大學生拳打曹章賣國賊，我們又看當時新出的新青年所提出的什麼科學和民主的口號，我們都覺得中國在這時

實在有走上獨立的路上可能。所謂科學自然是打破封建的虛偽的思想和提倡新的物質文明，所謂民主自然是打破個人獨裁的割據的軍閥政府而建設西歐式的民治的國家。這是怎樣適合了中國當時的要求！

然而帝國主義的大戰經過了四年的歷史終於停止下來了，接着，牠們又夾其更銳利的商品仍向中國侵掠，這把中國就淪爲半殖民地了。我們現在曉得華北是日帝國主義的勢力，東南是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西南是英法帝國主義的勢力。牠們儼然是瓜分了中國。中國歷年來的軍閥混戰無非是帝國主義本身的矛盾的反影。

五卅的革命高潮本來可以葬送了一切帝國主義在華的勢力，一步就能踏上到自由平等的大道的。但是五卅，可憐的五卅……

現在的中國更弄得愈不像樣了：東北的事變始終沒有解決，內部的紛爭又接踵而來！中國，中國始終是要飛躍，飛躍！